

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学理论和方法

刘重喜*

[摘要] “意法论”的提出者是清初杜诗学者陈之璠,也是清代诗论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意法论”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强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意法论”是在“以意逆志”的理论背景下、在清初杜诗阐释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古代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其概念命名、产生本源、文本依据以及作为批评方法的实践,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意法论;杜诗学;清代诗学;以意逆志

一、清初学者对“意法论”诗学理论的探赜索隐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学批评上,清代都是一个集大成的时期。与之相一致的是,清代也是文学阐释上“以意逆志”法的总结期。清代学者对“以意逆志”法的总结性,不仅表现在解诗过程中对汉儒以美刺说诗、魏晋人的得意忘言、唐人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人物象类型和以史证诗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上^①,还表现在对这一“千古解诗鼻祖”^②进一步发展上。在杜诗解意过程中产生的“意法论”,便是清人对“以意逆志”理论和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

“意法论”的提出者是清初杜诗学者陈之璠。之璠,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8)十二月,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字伯吹,一字孟朴,号朴庵,海宁人。邑庠生,“行严正慨直,与人处无匿情,赴义若不及。博极群书,淡于世味,远近钦其文行,竞延致家塾,俾子弟矜式焉。纂述甚富,手注《杜律》已刊行”^③。另据沈珩《杜律陈注序》:“先生(之璠)嗜古,思锐而功深,是可知矣。同时理学名家剡中黄梨洲,晦木、甬东万履安,桐乡张考夫诸先生,皆与先生称莫逆交。”与黄宗羲(1610—1695)、宗炎(1616—1686)兄弟、万泰(1598—1657)、张履祥(1611—1674)多有交往。除注《杜律》(即《杜工部七言律诗注》,又名《杜律陈注》)外,之璠还著有《朴庵诗集》等。其《杜工部七言律诗注·注杜律凡例》云: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23。

①张伯伟:《以意逆志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一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03页。

②陈醇儒集注:《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则言》云:“子舆‘以意逆志’四字,真为千古解诗鼻祖。”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

③《海昌陈氏家谱》卷六,清嘉庆十年(1805)刻本。

诗，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故诗解不合意与法者，虽名公巨手，沿袭千年，必为辨正。^①

“意法论”是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体现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与前代学者运用“以意逆志”法时特别强调读者之“意”的主体性原则不同，清代学者有意识地把“以意逆志”法纳入到文本的“意”与“法”——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进行探讨。陈沆《跋》之堦此书，谓其长处即在“能以意逆志”。从之堦注杜《凡例》来看，他认为要达到理解诗“意”（亦即作者之“志”），必须从诗“法”入手，二者“相为表里”，如果缺少了任何一方，不仅不能得作者之意，亦不能得作者之法，并且坚信这是杜诗解意最为重要的原则。

以“意法”进行“诗解”是陈之堦《杜工部七言诗律注》遵循的主要原则，卷一《题张氏隐居》注云：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

前四句叙入山之情与景，后四句写张隐之高，章法井然。曰“涧道馀寒”，曰“石门斜日”，虽公自述所历所到，而山居幽渺，便为下“杳迷”二字地。“乘兴”二字，蒙首二句来，“杳迷”二字，蒙次二句来，末句，蒙“不贪”二句来，意法层次如此。

陈之堦着眼于此诗的章法意脉：此诗从总体上看为四句分截，前四句叙入山情景，后四句赞张氏品格之高。从细处看，第七句以“乘兴”“杳然”分别照应首联和颌联，末句则与颈联合。由诗法入手，将诗中的层次缕清后，诗意便自然显示无遗，之堦将此称之为“意法”。

又如卷五《赠韦七赞善》注云：

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

北去关山开雨雪，南游花柳塞风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虾菜忘归范蠡船。

此赠韦赞善北归诗也。四语总叙乡里，言彼此衣冠居处之相似。四语两两分列，言彼此分别之景与情。诗中彼此分列其常也。此诗次联二句单指韦，一句兼韦杜，开阖变动，法尤奇妙，得此不惟前四语活，并全篇势亦动，章法意法，前后截然，一丝不乱。后半联法，一彼一此，亦具开阖势，故妙。“北去”，指韦，“南游”，公自谓。“关山开雨雪”“花柳塞风烟”，言南北皆春也。“洞庭春色”接“北去”句，谓别时春色堪令韦悲也。“虾菜忘归”，接“南游”句，时公率舟居，故以范蠡船自况也。

陈之堦分析此诗的要点在于“章法意法”。首先分析“章法”，指明此诗之大旨；其次分析“联法”，各句诗意之间的起伏照应。其中颌联为全篇关键，二句在赞韦的同时又巧妙地带出杜来，亦为后半幅写韦、杜双方“北去”“南游”惜别之意留出了空间地步。法奇意动，而又自然高妙，体现出杜律“波澜独老成”的艺术特点，是一首送别诗的杰作。

由以上二例不难看出，之堦解诗的关注点在于“章法意法”之间的浑然一体；章法、联法层次的丰富性与诗人感情的曲折变化相一致。这与其《注杜律凡例》中所说的“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这一诗学阐释的方法是一致的。

“意法论”的产生并非偶然，实际上清代学者大都持这一观点，在标举“以意逆志”的时候往往“意”“法”并举，用以注解杜诗。吴瞻泰《杜诗提要·评杜诗略例》云：

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严沧浪之诗品也。然皆在影响疑似之间。不若少陵自道曰沉郁顿挫，其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意至而法亦无

^①陈之堦：《杜工部七言诗律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不密，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①

瞻泰之所以否认严羽《沧浪诗话》以“高”“古”“雄浑”“悲壮”等诸“诗品”来论述杜诗的风格，是因为用语迷离惝恍，不够真切；他认为杜甫自道的“沉郁顿挫”一词最为恰合，理由是这个词“意”“法”兼备，“意至而法亦无不密”，最能体现杜诗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的风格特点。

再如范廷谋《〈杜诗直解〉自序》云：

每首则追溯作诗之意，复就其章法、句法、字法，一一抉剔无遗，加以评论。总不肯使难解者囫囵略过，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若一题至五首、八首、十首，则提出全诗纲领，并前后照应，脉络贯通，再加总评于后。务期意法兼到，不背作者本旨，使后人执要以求，或可得其从入之门也。杜诗首首皆有意法，无可区别。近见选家遇有多首者，截前割后，任意采择，殊失浣花老人经营布置之苦心矣。……予是编敢云独有所得乎？特以己之至情至性，体贴于上下千百年间，以期得当于万一耳。诗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之谓也。^②

与陈之璠从创作角度提出“意与法相为表里”的原则以及瞻泰从风格角度对“意至而法亦无不密”的肯定不同，廷谋从读者接受角度具体指明：为“追溯作诗之意”，一定要讲求“法”，这个“法”即字法、句法、章法以及连章之法；他认为“杜诗首首皆有意法”，因此要“追溯(杜甫)作诗之意”(即“以意逆志”)必须从“意法兼到”入手，方能得其门而入。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把清初学者的上述论述归结为“意法论”：“意”即诗意，诗人之情志(“以意逆志”之“志”)；“法”即诗法，诗意的表现形式；“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意法论”的典范文本是“意法兼到”的杜诗。

二、杜诗接受视角下清初学者“以意逆志”法基础上的“意法论”

张伯伟先生指出清代是“以意逆志”法在理论上的总结期，主要是对“能否以意逆志”和“如何以意逆志”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上体现出来的^③。如果从杜诗接受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察的话，我们清楚地看到清代学者对前者给出了肯定的意见，对“如何以意逆志”也给出了正面的答案，“意法论”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产生的。

“能否以意逆志”问题，换言之也是杜诗是否可解的问题。而诗“不可解”“解不得”“不必可解”，是清代之前学者们较为普遍的解诗观念。这一观念以宋末元初的刘辰翁和明代钟惺、谭元春《唐诗归》评论杜诗为代表。

《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一《望岳》“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二句，刘辰翁评云：“‘荡胸’语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见其趣。”卷十七《晓望白帝》“江帆隐天清，木叶闻语至”二句，刘批云：“不可解则妙耳。”《课小竖斲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泄云高不去，隐几亦无心”二句，刘批云：“解不得。”《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二句，刘批云：“南极朝北斗，不必可解”等等，如此之类甚多。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十八《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二句，钟云：“‘天阙’句不必解，自是奇句。”卷二十《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二句，钟云：“‘无私’二字解不得，有至理。”卷二十一《西阁雨望》“滂沱朱槛湿，万虑傍檐楹”二句，谭云：“有可思不可解之妙”等等，如此之类亦多。

① 吴瞻泰：《杜诗提要》，清康熙年末山雨楼刻本。

② 范廷谋：《杜诗直解》，清雍正六年(1728)范氏稼石堂刻本。

③ 张伯伟：《以意逆志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一章，第70页。

至明末清初，学者们却纷纷对刘、钟等人认为杜诗“不可解”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一一作出了“可解”的范例。

王嗣奭《杜臆》卷二《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二句，云：

“深山大泽”指江东，而“龙蛇远”以比巢父之隐。“野阴”“景暮”，以比世之乱。须溪（按指刘辰翁）云：“不必有所从来，不必有所指，玄又玄。”此不知其解而故为浑语以欺人，往往如此。

卷十《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落句（“经过忆郑驿，斟酌旅情孤”）才有“经过”，便忆“郑驿”，安得知己如君，为我斟酌

旅情之孤危耶？“斟酌”犹云商量，而钟以若不可解赏，盖不得其解而作欺人语也。^①

这是针对刘辰翁、钟惺二人“诗不必解”观点的反驳，认为他们其实是“不知其解”而故弄玄虚，以大言欺人而已。

黄生《杜诗说》卷七《晓望》：

白帝更声尽，阳台曙色分。高峰寒上日，叠岭宿霾云。

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荆扉对麋鹿，应共尔为群。

注云：

叠岭宿昔为云所霾，惟峰之高者始见日耳。地坼，谓岸高，因岸高故江帆隐。天清，谓境静，因境静故木叶闻。中二联写景并精妙。《论语》：“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七八暗反其意。而《遣闷》作“斯人难并居”，竟明言之矣。有彼作之明言，益见此结含蕴之妙。天清则无风埃，木叶有时自落，一闻其响；若风起，则但闻风声不闻叶声矣。此虽精意，语本不晦，须溪乃谓使人不可解，方是妙处。以此语为不可解，又以不可解为妙。吾今而知竟陵诗派，其源出于须溪也。^②

这也是对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和“近时奉为律令，莫敢异议”（钱谦益《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的刘辰翁评论杜诗“不可解”“费解”等观点予以的驳斥。

清人甚至对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不落言筌的解诗观念也进行了反驳，边连宝（1700—1773）《杜律启蒙·凡例》云：

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不取。至谓不堕理障，不落言诠，盖惩于宋人之迂腐，欲鉴嗜而废食也，其为风雅之祸尤烈。夫老杜之所以独有千古，远绍《三百》者，正以其精于理耳。于理既精，故言皆可求其所据。所谓如山东父老说农事，言言着实者，乐天乌足以当之？当此者惟我杜公而已。乃俗人耳食，动谓诗以不可解为妙，不知妙诗无不可解，渠自不解耳。若溺于沧浪之说，而务为刘安鸡犬归存无定之言，其不陷于野狐窠臼者几稀矣。^③

按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④云云，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⑤其观点便来自于严氏。但严氏的观点受到了边氏的强烈质疑，针对的即是“诗以不可解为妙”的观点，乃至认为于诗道风雅为害甚大。

以上王嗣奭、黄生、边连宝等人反对前人“诗不可解”的流行观点，是他们通过具体的文本解释之

①王嗣奭：《杜臆》卷二、卷十，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第47、359页。

②黄生：《杜诗说》卷七，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277—278页。

③边连宝：《杜律启蒙》，韩成武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页。

④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⑤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宛平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后得出的判断,而他们认为“妙诗无不可解”的关键在于诗法。吴瞻泰《杜诗提要·评杜诗略例》亦云:

“温柔敦厚”,诗之教,昔贤亦云“诗有别裁,非关学也”,何拘乎法?然自《三百篇》、楚骚、《十九首》、苏、李、曹、刘以下迄三唐,不离于法。而论者谓古诗如无缝天衣,必求之针缕襞绩间,愚矣。循是说也,将必以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甚且以不解为解矣。章法迷昧,线索未清,而一诗入手,即连称曰“佳句!佳句!”,以此论子美,安知不为蚍蜉撼大树哉?故此集一以论法为归。^①

《杜诗提要·自序》又云:

余尝选读杜诗以教子弟焉。非求简也,求其法而已矣。客有难之者曰:“法易耳。阎师小学之所优,何齿焉?必尽得古今诗人之体势,抉汉魏唐宋之藩篱,以兼通条贯于其间,而后成一诗家。而顾斤斤于方寸之末以言诗,何浅之乎视诗也?”嗟乎!执是说以论诗,如造室者去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而曰“吾能知体要也”。室不挠则崩,此不唯不知杜,并不知汉魏唐宋诸贤之诗也。虽然,诗以道性情,而法兼学力,使无离忧郁结香草美人之寄托,无以成骚赋之祖;无播迁夔蜀刻不忘君之本怀,无以造乎诗史之宗。是以知子美作诗之本不可学者也,子美作诗之法可学者也。吾特抉剔其章法、句法、字法,使为学者执要以求,以与史法相证,则有从入之门而亦可渐窥其堂奥,是不为浅也。^②

吴瞻泰对前人认为“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或者“以不解为解”也提出了质疑并断然否定,认为诗有“从入之门”,可以“窥其堂奥”,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诗法——“一以论法为归”。虽然以字法、句法、章法论诗,一般论者认为仅是便于初学,对诗歌这一“无缝天衣”无能为力,但瞻泰却认为“子美作诗之本”(“性情”)虽然不可学,但是“子美作诗之法”可以学,只有通过学习诗法方能进入杜诗之“堂奥”,并且他自信“论法”“是不为浅也”。

吴瞻泰这一观点,代表着他在文本把握上的追求和努力,把握文本的核心就是“诗法”。清初杜诗学者周篆也持同样的观点,并提出了“法脉”的概念,其《杜诗逸解》云:

人知杜诗之善,而不知其所以善;相与解杜诗,而卒不得其解。非杜诗之不可解与不可知也,不知法脉,则虽终日聚讼,而卒不得其解。不得其解,则虽极口誉之,而终非其所以善。故法脉为千秋诗文要诀,如自《风》《骚》沿于有宋,公尤独擅其长,穷极其变。彼煦煦之见,尽力于典故、名物、声调、字句之间,夫何足以言诗?

法脉者何?经营于未举笔之先,则如兵家庙算,不俟两军相当然后谋之者也;会通于既举笔之后,则如兵家之自卒而伍,自伍而队,上而至于裨将,又上而至于大将,无不心相输,意相洽,气相感,命之然而然,不命之然而无不然者也。真得其术则胜,不得其术则不胜。诗得其术则工,不得其术则不工。予自十五而学诗,窃闻世俗言诗之说,始而信,中而疑,终而为之忧。夫累字成句,累句成篇,籍非字句是工而谁工也?是以始而信也。然求工于字句者,自古及今何可胜数,卒不古人若也。不古人是若,而惟字句之工,其工为有益乎?抑无益乎?是以中而疑也。举天下之众,数百年之久,卒不得字句之效,将诗道自此而逐亡乎?是以终为之忧也。于是反覆思之,忽得法脉之说,恍然如出字句之上。初亦未敢自信,复得顾君小谢相与讲求,而疑始决。求之一首,求之百篇,求之诸体,求之全唐制人,莫不具见其然。故不惮出其臆见,为少陵开一生面。^③

①吴瞻泰:《杜诗提要》,陈道贵、谢桂芳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5页。

②吴瞻泰:《杜诗提要》,第3—4页。

③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清钞本。

正如洪力行《〈杜诗评律〉后记》所云“使读者了然得解于章句之中，自超然会心于章句之外”^①，周篆所说的“法脉”正包含在这两句话中：始而从字句、篇章入手揣摩，进而“恍然如出字句之上”，会通章法诗法于心，方能得杜诗言外之意。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②所谓“发言为诗，舒文载实”，从文本出发，通过其“法脉”来探寻其中所蕴含的诗意，应该是行得通的途径。对此，周篆显得信心十足：“凡属唐人，未有无法脉之诗，未有舍法脉而能得其解者。”

总之，清人通过对杜诗字法、句法的总结，尤其对章法细致的剖析，寻求诗歌的“法脉”，不仅可以把握诗歌字句的意思，乃至对于“恍然出字句之上”的言外之意也能够理解其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意法”解诗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也增强了清人对“诗可解”的信心，激发他们深入探索“诗法”的勇气。吴瞻泰敢于直斥社会上视诗法为小道（“法易耳，闾师小学之所优，何齿焉”）的固有观念，本身便体现出清人标举诗法的勇气和自信。卢元昌《杜诗阐·自序》云：

以意逆志，既又发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当年幽衷苦调曲传纸上。^③

黄生《杜诗说·序》亦云：

古今善说诗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之为言迎也。夫古人在百世之上，我在百世之下，虽以志形之于言，而欲从纸上探微索隐，使作者肺肝如揭，不亦难乎！

清代学者充分意识到了对古人诗意从文本阐释的艰难。正如黄生所感叹的那样：“欲从纸上探微索隐，使作者肺肝如揭，不亦难乎？”但是，他们为了“使古人栩栩出纸上，奕奕然千载有生气”的目标，进行最大努力的探索，并最终认为能够“使当年幽衷苦调曲传纸上”——从诗法得其诗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综上所述，作为“千古以来读诗第一妙法”的“以意逆志”^④，是明末清初以降的学者们注解杜诗普遍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清初杜诗学者又创造性地发明了“意法论”，从“诗法”“法脉”出发，结合字句的训诂、用典的解释，对字法、句法、章法的剖析，从而能够达到对诗意的理解。这不仅回答了“能否以意逆志”（诗意可解）的问题，也解决了“如何以意逆志”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以意逆志”法的理论内涵，是“以意逆志”论在新的时代学术背景下发展出的又一表现形态，“意法论”也成为了清代“以意逆志”论的核心内容。

三、作为批评方法的“意法论”：以杜诗文本为考察依据

“意法论”之所以产生于清代，这与清初杜诗学的兴盛有很大关系。正如陈之璠《凡例》所云：“唐诸家什，大都词藻有余，而意法精圆，奇浑曲折，千古推少陵独步。”“意法精圆”“意细法密”^⑤的杜诗是“意法论”产生最为重要的文本依据，“意法论”也成为清人以法释意和解意合法——这一诗学批评的重要方法。

陈之璠《杜工部七言律诗注·注杜律凡例》“诗解不合意与法者，虽名公钜手，沿袭千年，必为辨正”

①洪仲：《苦竹轩杜诗评律》，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

②刘勰：《文心雕龙》卷二，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③卢元昌：《杜诗阐》，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思美堂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④陈式《读杜漫述》云：“‘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则千古以来读诗第一妙法也。”陈式：《问斋杜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侧怀堂刻本。

⑤吴乔：《围炉诗话》卷三：“唐人作诗，意细法密。”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57页。

所列举的例子中：“如‘山腰官阁迥添愁’，及‘不去非无汉署香’，‘愁’与‘香’俱误指；公‘万古云霄一羽毛’误作痛惜；‘南极一星朝北斗’，误指秘书；‘疏灯自照孤帆宿’，误作公灯公帆。如此之类，不可枚举。”在辩正过程中，“意法论”是其最为核心的批评方法，现一一疏解如下：

其一，卷二《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注云：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

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

“迥添愁”，“愁”字与“城尖径仄旌旆愁”“愁”字义同，临深为高山，半孤危空，“迥添愁”，正形容山阁高危之势也。若作“愁闷”“愁”字解，全首无愁意，而次句底忽梗公自身上一字在内，万无是理。全篇皆言官阁所见，末似遥揣，仍带形容。

今按从全诗章法来看，颈联、颌联均为官阁所见之景，一为“语意至佳”（黄生语），一摹“物性之闲”（仇兆鳌语），其融景之情皆为“闲静自适”之意，则第二句的“愁”字如果属“感时怀乡之愁触景而生”（张性语）而言^①，则显然与全诗命意不合，有望文生义之感，因此“愁”字应是形容山阁高危之势。

其二，卷四《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一注云：

高栋曾轩已自凉，秋风此日洒衣裳。悠然欲下阴山雪，不去非无汉署香。

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夹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乔履，真赐还宜出尚方。

全诗皆美终明府，独第四句注家属公，前后不伦，亦无此诗法。愚谓公自注：“终明府，功曹也。兼摄奉节令。”兼摄句为末二句而设，功曹句为第四句而设也。功曹亦汉制，官得称汉署，公曾召补京兆功曹，有诗云“功曹非复汉萧何”，此亦汉署一证。此第四句言终虽摄令在此而不去，非无汉署之香也。“开锦绣”“奏笙簧”写地之胜，即可以想见其为人。尾便接以“看君”二字，美其才，奉节令当即真不但摄也。

此注首先从“公自注”入手，认为“汉署”当指终明府所任“功曹”一职；其次从“诗法”角度分析，全篇皆美终明府，不应第四句忽然阑入杜公自己，此句仍属赞美终明府之词。这与日本大典禅师的观点“明府虽不去，在朝亦不无汉署之香”正相一致^②。

其三，《杜工部七言律诗注》卷五《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云：

“万古云霄”句，全首只此一句是虚，前辈以为劣，或然。至解云：与昔人所云“孔明事业等鸿毛”同意，则置“万古云霄”四字于何地？且痛惜意或在结联，前六句赞颂中，忽梗一痛惜语，上下文义不贯矣。

此注亦从篇法角度，联系“上下文义”释意。《杜甫全集校注》卷十三《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虽未引之壘之说，但从所引伪王洙注“（一羽毛），言声名飞扬，独步万古”和俞浙“一羽毛者，非谓轻如一羽毛也。一，独也，特异之谓也。孔明之于人也，犹鸾凤鸾鸾，高翔于云霄之上。盖羽毛之独特奇异者，万古之所共仰望，不可梯及也。赞美之词也”^③等观点，足证此注不谬。

其四，卷四《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注云：

青帘白舫益州来，巫峡秋涛天地回。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

贪趋相府今晨发，恐失佳期后命催。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

杜相公自蜀归朝，辟李入幕，杜盖先行而李追赴也。四句舟行之景，四句赴幕之情。倒听枫下，背指菊开，语创特奇。南极、北斗，五云、三台，句自为对。后半，上二句指李，下二句指杜。极意摹写，郑重尊荣，却又是李舟中遥望，光景如画。南极星在益州分野，杜节度

①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772—2773页。

②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十六，第4634—4638页。

③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十三，第3857页。

自益州入朝，故曰“南极一星朝北斗”。三台星在北斗旁，朝北斗者，三台五云多处是也。公《赠李三十韵》“台星入朝谒”指杜，不指李，可证。

此诗末联“南极一星”何指？历代注家争议很大，有李秘书（赵次公）、“公自寓”（黄生）和杜相（浦起龙）三说^①。此注从章法分析，“上四句舟行之景，下四句为赴幕之情”；又从联法分析：“后半，上二句指李，下二句指杜。”“南极星在益州分野，杜节度自益州入朝”，故末二句指杜而言。“台星入朝谒”句，见于与此诗同时所作的《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中，台星，据《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宋人赵次公、蔡梦弼及清人朱鹤龄皆谓杜相鸿渐，注家皆无异词^②，以杜证杜，当以“指杜”为善。

其五，《杜工部七言律注》卷四《夜》注云：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独夜旅魂惊。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

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

前四句夜景，后四句夜情，而景中情，情中景，又难以悉。次联句法一气贯下，灯照孤帆宿，月悬双杵鸣也。三联得力全在“南”“北”字，非此二字不惟二语少神，全篇亦为减色。上四字略断。可笑注家上联应连者断之，下联应断者连之也。曰“空山独夜”，曰“步檐倚杖”，则知乃夔之阁上，非舟中也。阁上所见江船之灯，故不曰孤灯，而曰疏灯。疏灯各自照宿与公无干，故曰“自照”；时已夜而砧声未已，且新月尚悬其上，故曰“犹悬”。“自”字、“犹”字，皆旅中惨澹之意。解得此者，则全首字字是旅魂惊也。阁之廊曰“步檐”，步非步月之步也。时解误云公自照孤帆宿，既宿又起而步，步又倚杖而立。岂杜老此夜忽而舟中，忽而阁上，上落不宁，卧起无定，一至是耶？万无是理。

“疏灯自照孤帆宿”，之壘辩驳前人所解“公灯公帆”为误。首先，是从全诗章法看，“前四句夜景，后四句夜情”，全篇景中含情，情中有景，交融浑成；其次，由第二句“空山独夜”和第七句“步檐倚杖”，可知杜公身在阁上而非舟中，俯视江船，故不曰“孤灯”而曰“疏灯”。另外，从字法来看，所谓“自照”，自然与杜公无关，不仅可证杜公不在舟中，亦寓客居惨澹之意。仇注系此诗于大历元年秋作于西阁^③，也为此注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旁证。陈訢《杜律陈注·跋》提到其叔父之壘曾论及此诗，“犹忆举‘不夜月临关’‘步檐依杖看牛斗’两解，极浅极真，前人未道”，对此注推崇备至。

如果说陈之壘以章法、联法等诗法作为“意法论”论诗核心的话，那么黄生所持的诗法主要是句法。首先黄生论诗讲求“诗法”，《诗麈》卷一：

王元美谓：“章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最上一乘法门，即工巧之至而入自然者也。诗家火候未至，岂能顿诣此境？故作诗不讲章、句、字三法，非邪魔即外道。^④

而在章法、句法和字法三者之中，黄生尤其注重句法，“炼字莫过于六朝，炼句莫过于唐人”，认为“极尽变化”的句法是唐诗的重要美学特征。黄生对杜诗近体句法分析得最为细致，所列句法共计79种，可谓集古今句法之大成^⑤。

黄生认为读杜诗须先明句法，句法不明则诗意不明，这是其所以探究杜诗句法的原因所在，正所谓：“句中之法尚不能识，况识其言外之意耶？”^⑥其《杜诗说》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卷四

①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十六，第4743—4749页。

②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十六，第4734页。

③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67页。

④黄生：《诗麈》，《黄生全集》第四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刘重喜：《黄生论杜诗句法》，《文学研究》第2卷第2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⑥黄生：《杜诗说》卷五《中宵》“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二句注，第166页。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二“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二句注：

越女亦愁，燕姬亦湿，特分装成对耳。赵注琐屑可厌，皆所谓参死句者。^①
今按《赵子常选杜律五言注》卷一注云：“三四应‘雨沾席’，与贵公子游，故舟中兼有南、北之姬，而北妇不惯乘舟，且值风雨，故愁。”^②其实此二句用的是分装句法，意为越女与燕姬红裙皆湿，翠黛皆愁。黄生认为赵注之所以释意有误，是不明白此诗为分装句法（两句分装成句者）所致。

《杜诗说》卷五《禹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二句，注为“歇后句”，并云：

“早知”，歇后“如此”二字，此正用俗语，其意则指五、六而言。后人既不解此二字，又不识其言外之意，恣为谬注，遂使杜公之诗，亦如江渚雍塞。赖予与诗友洪子（今按指洪仲）排决而通之，差许杜氏功臣矣。^③

卷五《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暗度南楼月，寒深北渚云”二句为“直述句”，并注云：

三、四句法极易游移，错会即失其意。当云：暗度了南楼月，寒深了北渚云，谓雪暗之寒之也。此直述句也。^④

正所谓“佳句法如何”（杜甫《寄高三十五书记》），《木天禁语》引曾氏之语所云：“古人造语，每意精语洁，字愈少意愈多，意在言外，悠然而长，黯然而光。此非后人之所及。”^⑤相比于古文句法的参差随意，诗歌的句法与诗意之关系其实也是相符而行的；不过因为诗歌大多限制在五、七言句式且篇幅短小，因此，诗人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表达丰沛的情感，只能充分地利用五字、七字之中的停顿、转折、对偶、互文、装点等关系来表情达意，从而形成了诗歌独特的句法。因之，要想理解诗意，必须知道这些诗歌的句法不可。尤其是杜诗句法，有传承，有创造，“工巧之极”，“意”“法”兼备，更是要非明白不可，否则“错会即失其意”。

黄生注杜诗亦以“以意逆志”为归，他在《杜诗说序》中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余以为说诗者，譬若出户而迎远客，彼从大道而来，我趋小径以迎之，不得也；彼从中道而来，我出其左右以迎之，不可也。宾主相失，而欲与之班荆而语、周旋揖让于阶庭几席之间，岂可得哉？故必知其所由之道，然后从而迎之，则宾主欢然把臂，欣然促膝矣。此以意逆志之说也。^⑥

如果要得作者之意，便要知道其“所由之道”，这个“所由之道”即陈之璠所说的“诗法”，或者黄生所说的“笔墨”，只有明其诗法才能得其诗意，作者、读者，宾主方能把臂促膝，文心相洽。从以上陈、黄二家的杜诗注解实践来看，“意法论”不仅是二人所运用的“以意逆志”法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诗学批评的主要方法。

四、结语

张伯伟先生近期发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一文，论题的宗旨是：“加强对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与实践，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文中指出：“我们在进行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和探索时，其基本原则就应该是以前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

①黄生：《杜诗说》卷四，第114—115页。

②查弘道：《元虞道园明赵东山两先生原本杜律选注》，清嘉庆己巳年（1809）新刻本。

③黄生：《杜诗说》卷五，第161页。

④黄生：《杜诗说》卷五，第193页。

⑤张健编：《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⑥黄生：《杜诗说·序》，第1页。

仿或对抗的误区,在与西洋学术的对话中形成其理论。”^①“意法论”是在“以意逆志”的背景下、在清初杜诗阐释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古代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其概念命名、产生本源、文本依据以及作为批评方法的实践,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意法论”不仅可以应用于诗学批评领域,也同时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接受和认同。如清初冯班论历代书法:“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②“意即是法”,指书意与书法相一致,正与陈之璥提出的诗“意与法相表里”观念不谋而合。笔者还会将专文就这一问题继续探讨。

(责任编辑:高峰)

Theory of *Yifa*: A Poetic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the View of Dufu's Poems

LIU Chong-xi

Abstract: The poetic theory of *yifa* 意法 (literally theme and form), proposed by Chen Zhixun, was well accept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both the theme and the pattern of poems, Chen's theory emphasized the organic unity between content and form. As an importance poetic theory and method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the *yifa* theory was not only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poetic theory that advocated accessing the poet's intention through developing du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 at issue with the help of one's personal experience but an achievement in the studies on Du Fu's poem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s well. Chen's theory is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with well-defined concepts and terms, reliable theoretical and textual sources and workable methods for doing poetic criticism, thus having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theory and method for do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theory of *yifa*; studies on Du Fu's poetry; poetic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accessing authorial intention via personal understanding

①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

②冯班:《钝吟杂录》卷六,何焯评、李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4页。